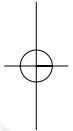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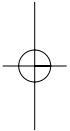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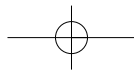
一般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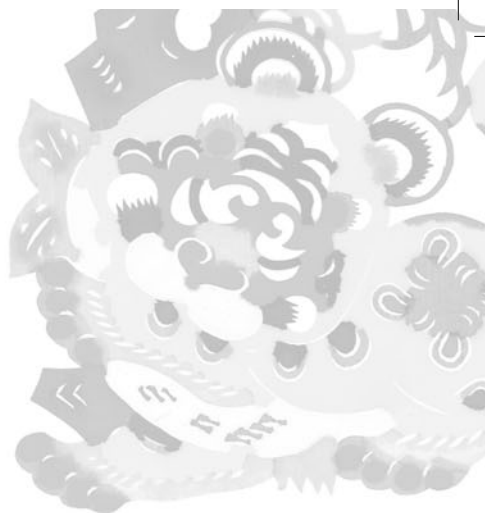
跨國性社群電視媒體初探： 以《台灣媳婦》為例

王俐容、王維菁、朱淑娟*



* 王俐容為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E-mail: ljwang@ncu.edu.tw
王維菁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weiching@mail.utexas.edu
朱淑娟為桃園市東門國民小學教師，E-mail: ta02068@yahoo.com.tw





摘要

在全球化與跨國社群流動的時代裡，媒體一方面協助跨國社群維繫與原生社會的文化關係，一方面仍繼續扮演文化同化者的角色，許多研究均指出此一複雜矛盾的狀況。本文以台灣少見特地為新跨國社群「新移民女性」製作的電視節目《台灣媳婦》為例，探索跨國社群與台灣跨國社群媒體之間的文化關係，研究新移民與跨國性社群媒體的互動是否帶來同化、抵抗、社會整合或其他社會文化影響，並理解新移民如何建構她們在台灣社會中的文化認同。

關鍵詞：文化認同、跨國社群、跨國媒體、新移民女性

智慧藏



壹、前言

全球化與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的浮現及流動，是當代社會科學關注的議題；在文化、地理與國家主權疆界一一瓦解後，文化研究學者尤其重視多元、混雜甚或衝突的認同與文化經驗，如何被建構與維繫。其中，因著各種新媒體科技的發展與多元化，跨國社群打開一個新的意義產製領域，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與社會脈絡，不斷重新定義、協商、建構出新而變異性更高的文化認同，並且交換如何在新社會生存的方式與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媒體一方面提供跨國社群維繫與原生社會的文化關係，一方面也繼續扮演文化同化者的角色。有鑑於此，本文將以台灣所形成的跨國社群「新移民女性」——或俗稱外籍新娘、東南亞新娘——的經驗，探索跨國社群與台灣跨國社群媒體之間的文化關係，研究新移民與跨國社群媒體的互動，是否帶來同化、抵抗、社會整合或其他社會文化影響。本研究主要的文本分析對象為《台灣媳婦》節目，並經由越南籍配偶之訪談，來理解新移民如何與這個國內少見的電視節目互動，又如何建構她們在台灣社會中的認同與文化關係，同時從台灣的經驗出發，檢討與反省相關媒體理論，特別是文化同化論與文化整合論部分，以及跨國社群理論的問題。

貳、跨國社群與跨國主義的形成

以英美新自由主義為中心、於七〇年代開始發動的當代全球化，在八〇年後，獲得迅速的發展，其影響加快了跨越國家邊界的各種流動，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論述，如 Appadurai（1990）指出全球化五種流動，包括：種族的流動（ethnoscape）、科技的流動（technoscape）、資本的流動（finascape）、媒體的流動（mediascape）與理念的流動（ideoscape）。這些流動帶來了交錯的文化、多重認同、種族政治經濟衝突與合作

，以及各種社會影響，紛紛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課題，也使全球化一詞成為高度複雜與價值對立的概念。在九〇年代，外籍勞工、外籍新娘與大陸新娘在國際全球化歷史背景下，進入台灣社會，相似於其他國家，這個新的族群流動，也為台灣社會帶來迥異於過去的經濟、文化、政治與社會挑戰。

「跨國社群」的文化發展被視為超越本土、國家，不斷演進或擴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活動與社會連帶、政府政策有著複雜辯證的關係。一方面，跨國社群往往和移出、移入的國家，維持著兩方的密切連結，其建立的網絡系統，立基於相關連的文化，或是語言象徵所形成的共同認同之上，因此，經由個人或是集體的文化行為、影像、語言、宗教儀式與媒體消費等機制而完成的文化活動，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雖然文化是能動的，卻需要放在具有邊界的領土與特殊的社會空間下被考量，因此，文化意義的生產、傳達與擴散，必須附著於社會與象徵的連帶。易言之，研究「跨國社群」文化的發展過程，包括：個人或集體的文化行為、中介的文化產品與再現、社會機制與政府政策、整體國際情勢發展等，需要在不同層面的互動中進行觀察。

九〇年代末期開始，「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與「跨國社群」成為研究國際移民的一個重要詞語，跨越了許多不同的學術領域，如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文化研究，都試圖以跨國主義這個概念來分析與追溯跨國社群的發展、落實，並檢視在愈來愈強的全球化世界中，認同、差異與文化公民權如何跨越國家的邊界交錯發展。學者也以不同的跨國社群的經驗，探討跨國主義可解釋的範圍與限制，如 Riccio (2001) 以塞內加爾社群在義大利境內的生活經驗進行分析，推論「跨國社群」的概念較「族群團體」(ethnic group) 有更為豐富多元的文化詮釋力。

然而，什麼是跨國社群或是跨國主義？Vertovec (1999) 指出了六個概念：(1) 跨國主義被視為強調一種新的、跨越國家邊界的社會型態；(2) 跨國主義是一種離散的意識 (diasporic consciousness)；(3) 跨國

主義是一種文化再製，通常被指認為文化融合（syncretism）、混合、轉化（translation），或是混種（hybridity）；(4) 跨國主義是一種跨國企業資本流通的途徑，並且是一種小規模但卻相當重要的方法，藉由移民者對於家人或朋友的匯款而形成；(5) 跨國主義是一種政治的交錯，主要由母國的政治與政府機制、離散的團體與擴展中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共同互動所致；(6) 跨國主義是一種對於「地方」概念的重新組配。

Portes, Guarnizo, & Landolt（1999: 221）也區分了三種不同型態的跨國主義：經濟的、政治的與社會文化的跨國主義。(1) 經濟的跨國主義關注企業補給、資金流通與市場分布的網絡如何超越國家邊界而運作；(2) 政治的跨國主義則在意政治的活動，如政黨官員、公務部門、社群領導者如何達成與影響國家接收或是移出群眾的政策；(3) 社會文化的跨國主義指的則是許多海外移民仍保有原生國家認同的活動，如在美印度人舉辦傳統慶典，以強化原有的印度認同。這些活動在過去移民的波潮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傳達出移民者在轉換文化與選擇文化時，內心的需求與渴望。

本文側重與跨國社群相關的社會文化影響，特別是文化與認同方面。例如 Faist（2000）指出，跨國社群帶來了「文化跨國主義」（cultural transnationalization）的結果——跨國性的融合（transnational syncretism），如融合的文化實踐、混雜的語言，以及多重性的認同。部分學者也指稱這一文化混雜（cultural hybridity）的結果，將帶來更豐富創新、更多元民主、更去中心化，也因此更具挑戰主流威權文化能力的新文化（Appadurai, 1990；Featherstone, 1990；Tomlinson, 2000）。

與其他主張文化多樣性的學者相似，Faist（2000）採取了「動態」的觀點來思考文化，將它視為超越本土、國家，不斷演進並擴散的過程；然而，他認為這樣的理解還不夠，更進一步的分析方式，應該去尋求文化意義的建構，是否附著於社會與象徵的連帶之上，又如何私人或公共的行為、影像、機制或語言中被生產與傳達。社會與象徵的連帶，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內容，既不可能突然消失，也不會偷偷出現；而事

實上，跨國主義象徵與意義的傳布、進行，都必須經由社會連帶來協助，以維持超越邊界的多重轉換。因此，Faist 進一步強調，雖然文化是能動的，卻需要放在具有邊界的領土與特殊的社會空間下考量，也就是說，移民文化無法在去邊界化的空間（deterritorialized space）中生存與發展。

認同也是有關跨國社群的重要議題之一。Vertovec（2001）指出，跨國主義與認同是並置且相互交錯的概念。一方面，許多人的跨國網絡系統建立於他們所共享的認同形式之上，立基於相關連的文化或語言象徵，這些網絡被標示著溝通的型態，具有交換資源與情報功能，並連結相關社會文化與政治活動的參與。另一方面，在當代的跨國社群中，個人或是團體的認同，都不止與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社會有關，更呈現為一種反覆協商甚或衝突的過程；跨國社群往往和移出、移入的國家同時維持著兩方的密切連結，此兩方連結不時會有衝突或消抵，其維持連結的方式則包括婚姻聯盟、宗教活動、媒體與商品之消費等（Vertovec, 2001），而媒體的重要性，已逐漸受到學術界重視。

參、跨國社群與媒體關係之發展

如同 Portes et al.（1999: 220）指出，社會文化的跨國主義指涉各種強化海外移民保有原生國家認同的活動，經由這些活動，可傳達出移民者在轉換文化與選擇文化中的渴望。以目前的科技發展來看，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平台，雖然長期以來，媒體研究與移民研究似乎在學術界被視為兩個分離而不相干的領域，但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媒體與移民兩者卻密不可分（Gillespie, 2006）。

在 2001 年九一一事件後，學者逐漸關注到伊斯蘭文化、跨國社群與媒體之間的關係，發現媒體為跨國社群打開一個新的視窗，使他們得以跨越各種文化與社會脈絡，不斷重新定義、協商與建構新的文化認同（Gillespie, 2006）。Grillo（2004）在知名學術期刊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的特別號 Islam and Transnationalism 中，即撰文探討伊斯蘭教如何運用新媒體作為教義宣傳工具，研究結果發現，他們可運用之工具，不僅是傳統常見的手冊、錄影帶、DVD、雜誌（如 *Muslim News*），還包括網路（如 IslamiCity 網站），讓身處於英國曼徹斯特、德國柯隆，或美國洛杉磯的伊斯蘭教徒，都可以方便地學習各種伊斯蘭文化知識，以及交換如何在「西方」社會生存的經驗。學者認為，媒體的使用的確可以幫助伊斯蘭教徒跨越國家、文化種族的邊界，持續強化自我認同，以對抗主流西方社會同化的企圖，但媒體也開拓了一個新的公共領域，讓認同、歸屬、安全感等議題不斷被質問、重新定義、修正與檢討。也就是說，年輕一代的伊斯蘭教徒，不但使用媒體來強化自我信仰，也同時挑戰傳統教義，在自己所屬的社會、文化或政治架構下，重新定義自我，而不只是單向性的洗腦或灌輸（Gillespie, 2006）。

跨國社群所形成的媒體，除了能夠連結他們與原生國家的關係及認同，也扮演了其他的角色，尤其在提供生活基本資訊上，功能更為顯著，諸如協助跨國社群瞭解移居國的經濟、政治、社會領域等。不過，資訊有很多形式，每個形式效果不一，且資訊會因時間而可能產生變化（Vertovec, 2001）。

在跨國空間中，不斷流動的人口、資本、商品、資訊及符號等，往往引發跨國社群成員的認同變遷，而移民人士又會利用其對於地方的記憶與想像，建構屬於自己的認同與歸屬；在這個動態過程中，跨國社群媒體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提供了認同的文化素材來源，具有相當重要的促進認同功能。McGrath（2002）針對第二代韓裔美國人所作的研究顯示，使用韓國媒體的學生，較容易認為自己就是韓國人，而純粹使用美國當地媒體者，則較趨向於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在美國，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的華人分散各地，但透過華語電視、報紙、雜誌、影帶等媒體使用，族群文化的認同獲得增進，想像的社群於焉產生，生活適應能力也因為交流而提升（Shi, 2005）。所以延伸來看，藉由認同，移民得以跨越國界形成「跨國性的想像社群」。孫治本（2000）的研究可協

助解釋此一概念。他指出，從族群媒體——以凝聚族群認同，並加強內部溝通為主的媒體——的報導，至全球化對於社區與社群的影響，皆可能促進此一跨國性想像社群的產生，即：全球化產生了跨國界、跨洲際之社群，建立起新的人際社會關係；這種全球化的跨國結合，使得「天涯若比鄰」的概念增強，而這樣的跨國社群，也造成「去空間化」的結果，民族與疆域不再是一固定之連結，想像成為民族連結的要素；尤其，大眾媒體提供了想像的文本與內容，也成為民族在想像過程中之重要媒介。

肆、同化、反抗或整合？跨國社群媒體的文化影響

跨國社群與媒體的關係往往面臨一些衝突與兩難的狀況。從社會整體角度觀之，媒體一方面扮演同化跨國社群的角色，加速跨國社群的當地文化適應及語言使用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為強化跨國社群與原生國文化關係之媒介，促進跨國社群內部的族群認同。此外，媒體對族群內部整合與認同之影響並非全然正面、一致，縱然它能提供族群認同素材，但同時也會讓傳統的族群文化觀點受到質疑與挑戰。

因此學者不斷意識到，跨國社群媒體的角色不但複雜，且難以釐清，甚至可能同時扮演著同化與反抗同化、強調差異的角色。王嵩音（2000）指出，跨國社群媒體可以抵抗同化，如：

- (1) 內容上明確呈現反霸權論述。
- (2) 全使用弱勢族群母語。
- (3) 立一套有別於主流媒體的議題優先順序。
- (4) 報導弱勢族群社區的活動，以加強社區參與。
- (5) 弱勢族群媒體較少出現主流廣告，因此可避免同化。
- (6) 弱勢族群媒介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反同化的象徵意義。
- (7) 弱勢族群媒體新聞工作者在媒體累積的專業經驗，有助推展弱勢團體抵抗主流社會的運動。

相反的，Riggins（1992）彙整諸多跨國社群媒體的研究，提出跨國社群媒體具有同化功能的特色，如：

- (1) 跨國社群媒體的內容隱含強烈的族群意識型態。
- (2) 跨國社群媒體的製作難以脫離主流文化對媒介類型的定義，不容易製作出真正具有弱勢族群特色的節目內容。
- (3) 跨國社群媒體集中報導特定族群或部落，可能會造成自我隔離的反效果。
- (4) 跨國社群媒體若以較廣大的閱聽眾為目標時，將促成更多與主流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 (5) 跨國社群媒體若使用主流語言而非母語將會加速同化。
- (6) 跨國社群媒體透過傳播科技的傳遞過程，可能使原有的觀點受到扭曲。

近年來，傳播學者逐漸修正「同化」與「反抗」兩種截然對立觀點，指出跨國社群媒體的影響，應該從「整合」（integration）的角度來思索。Arnold & Schneider（2007）指出，社會需要與其所有的部分，高度連結成爲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的基礎即在於「意義的共享」；爲達成此目的，社會整合將是重要的關鍵。然而，整合並不是某一方完全順從或同化進入另一方，相反的，整合需要接受不同種類的差異、多樣的共存，經過彼此之間的相互學習後，才能完成，因此社會整合是各種團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融合、共同建構的結果。他們也分析，整合是社會成員不斷交換訊息、交流知識與交互理解的持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共同的價值、認同與意義。

換言之，整合有賴高度的溝通，因此在傳播研究中，愈來愈多人開始對於大眾媒體扮演的「整合角色」感到興趣。例如，關於少數族群與媒體的研究，往往特別關注大眾媒體所勾畫出的圖像，如何影響社會整合過程，以及其他社會成員如何看待這個少數族群；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研究開始關注媒體的消費與社會整合過程，是否具有確切關係；再者，語言的使用、資訊的傳播、媒體對價值與意義的建構等，將如何影響

特殊族群與其他社會成員的整合，或影響他們對於自我社群的想像，亦均是備受矚目的研究議題（Arnold & Schneider, 2007）。

至此，「整合」的觀點，似也成爲一種去權力化、去衝突化，以及具社會功能論色彩的論述。不過，在討論社會整合的概念之際，不同族群團體的文化、經濟、政治與社會資本，以及權力之不平等，並未被細緻呈現，而對溝通、理解、接受、學習與達成整合的過程描述，也未能在權力不平等的真實下，公平地呈現出來。由此可見，整合也許隱含著壓制與內在衝突的因子，迫使弱勢族群發生自我文化壓抑之狀況。

因此，跨國性媒體的角色與功能究竟是什麼、應該是什麼？事實上，由於每個國家、文化，乃至每一跨國社群之社會地位不同，且媒體被賦予及期待的文化、政治目的亦不同，故跨國性媒體的角色與功能必有差異，研究者需要立基於台灣社會的獨特情況加以探討，始能釐清。

伍、研究緣起與方法

近年來，台灣男子與東南亞、大陸女性結婚的人數增加，本地社會逐漸出現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社群，相關的法律政策、健康醫療、婚姻關係、親子教養等研究也蓬勃發展，但對於跨國社群與媒體關係的研究卻還不多見，針對跨國社群而製作的媒體內容也相當缺乏。本文研究者觀察到，在 2005 年曾經出現一個針對東南亞與大陸配偶製作的電視節目《台灣媳婦》，雖然並沒有引起太多迴響，但兩年內已經重播四次，且與內政部等機構有所配合，顯有研究價值，故本文擬從《台灣媳婦》的文本分析出發，結合越南籍配偶的閱聽人研究，探索台灣跨國媒體內容是否帶來同化、抵抗、整合或是其他文化影響，並希望更細緻地瞭解閱聽人與跨國媒體內容之具體互動。

本文強調的是，「跨國社群」作爲台灣社會重要成員之一，而台灣社會提供這群「台灣媳婦」什麼樣的媒體內容？本研究將從文化同化、尊重多元文化差異與我族中心主義三個角度，分析該節目之文本，並由

越南籍配偶事先觀看幾集節目後，施以深度訪談或焦點團體討論，從她們的眼光與立場，剖析閱聽人如何理解、詮釋這些文本，進而建構屬於自己的文化意義，而這些文化意義又將形成如何的價值及社會影響。

參與本研究之閱聽人，均為桃園縣東門國小成人教育班中的新移民女性，為避免國籍差異影響，統一選擇越南籍配偶進行訪談，^[1]訪談人數係以訪談是否未再出現新的有效資訊為判斷依據。總計訪談對象為 24 人，總計訪談人次為 29 次，訪談進行時間為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6 月。由於大部分受訪者未曾看過該節目，因此在訪問前，均先播放錄製之節目內容，^[2]待受訪者觀看後，再進行訪談。訪談方式有二，一為焦點團體法，二為單一深度訪談法。焦點團體法使用三次，主要利用成人教育班下課時間，與數位越南籍配偶一同觀看《台灣媳婦》文本後進行討論，每次約有四至八名不等之受訪者；單一深度訪談則另約時間。訪談地點包括：東門國小教室、受訪者工作處等，儘量讓受訪者離開公婆視線以得到最真實答案。每次訪談約一小時，其中五位受訪者接受兩次訪談，受訪者資料參見附錄表 A。

陸、台灣跨國社群與跨國社群電視媒體之互動

一、跨國社群媒體新發展：《台灣媳婦》的出現與內容架構

《台灣媳婦》共製作 165 集，每集含廣告時間約近一小時，收視對象多是東南亞地區或大陸籍配偶，及其家屬、外籍人士與及關心外籍配偶問題之觀眾。該節目於 2005 年江霞擔任華視總經理任內時製作，也被視為台灣第一個針對「跨國社群」製作之電視節目，此前雖有服務泰勞、菲勞的廣播節目，但電視部分並未出現。江霞當時接受訪問指出，因經常聽到「外籍新娘」受虐故事，故希望藉由這個節目「讓她們學習並認同台灣」，也期望外界能藉此多了解外籍新娘，不要再讓她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吳啓綜，2005.05.03）。在《台灣媳婦》首集節目中，江霞也說，每次聽到「我的媳婦是買來的，或是我的媽媽是買來的」這樣

的言語，她都感到很心疼，因此她希望透過這個節目，呼籲社會相互理解與包容。根據江霞在不同媒體接受訪問之內容，大約可以整理出華視製播《台灣媳婦》的三個官方目標：(1) 幫助外籍配偶融入台灣，(2) 增進台灣主流社會對外籍新娘的了解，(3) 促成整體社會的相互理解與進一步的包容；此三目標基本上也構成節目與其論述正當性的來源。

除了上述文化同化、生活協助、文化理解及社會整合等涉及政治、文化與社會的目標外，我們也發現該節目受到四個較為隱性、或未被公開宣示的文化脈絡背景高度影響，這些影響交互穿插並時有重疊。

其一是女性文化以及強化女性傳統性別角色之背景。例如，《台灣媳婦》的「媳婦」一詞，本身即高度負載著台灣社會對此一角色的規範、期待與價值行為標準，而節目中也不斷重複出現「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或強調照顧家人為「台灣媳婦」的本分與無庸置疑的責任。

其二，《台灣媳婦》刻意凸顯台灣本土意識與色彩。像是選擇本土色彩鮮明的女藝人潘麗麗擔任主持人，並經常穿插閩南語對白，片頭音樂也以閩南語發音：

口白：她從蘇聯來、她從日本來、她從越南來、她從泰國來
；無論她從哪裡來，她都是咱們的「台灣媳婦」！（華視《台灣媳婦》，每天播出的片頭曲）

其中許多單元的設計，如「台灣啥米都有」（台灣什麼都有）、「生活小撇步」（生活小秘訣）等，也都藉由閩南語發音與用字選擇，刻意突顯本土特色。節目中更是常常呼籲：

主持人：「咱台灣人」心要更寬廣一點、更包容一點，不管他從哪一個國家來，只要在這塊土地上，他就是我們的朋友，台灣之友。（華視《台灣媳婦》，2006.10.23）

其三是爲了減少社會衝突而強調的社會和諧（忍耐）與利他主義。負責製作《台灣媳婦》節目的艾迪斯傳播公司，在接受本研究電話訪問時，表示該節目的主要理念，是希望新移民儘快「融入」台灣社會，減少問題發生；所以除政令宣導外，乃以政府希望減少社會問題、強化社會整合的角度出發，認爲只要新移民了解台灣主流文化，融入或同化於台灣社會，忍耐並利他地過日子，那麼相關的社會問題將減至最低，跨國婚姻的問題也會降至最低。上述觀點不斷出現於節目內容之中：

主持人：不管是談戀愛或為家庭嫁過來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路，不管怎樣還是要**忍耐**走下去比較好。（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8.17）

其四則是高度政治與社會實用主義的特質，明顯可見的是配合政府政令宣導，以及對生活、習俗、技能的引介。《台灣媳婦》節目內容設計多以實用爲主要目的，相關單元如：「台灣媳婦的生活與風俗」、「台灣家庭互動等」、「生活小撇步」、「媳婦說台語」、「台灣啥米都有」、「中文輕鬆學」等。在 165 集《台灣媳婦》中，主要的系列內容如表 1。

表 1：《台灣媳婦》節目製播的系列與內容分類^[3]

項目	系列單元與相關內容
1	移民法制度系列（內政部）*
2	外籍配偶家暴防治系列（內政部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	新厝邊的故事徵文活動系列（民進黨婦女部）
4	新移民會館（台北市民政局）
5	新移民學習中心（教育部）
6	外籍配偶的聲音系列（台北電台）
7	各基金會對外籍配偶的服務系列
8	社區大學為外籍配偶開辦之課程系列

表 1 (續)

項目 系列單元與相關內容

- 9 台灣生活適應系列
 - 10 外籍配偶心理調適系列
 - 11 婚姻故事分享系列
 - 12 夫妻相處系列
 - 13 婆媳相處系列
 - 14 家人疾病防治及照顧系列
 - 15 親子溝通技巧系列
 - 16 兒童居家安全系列
 - 17 家事輕鬆做系列
 - 18 家人營養系列
 - 19 台灣小吃系列
 - 20 環保 DIY 製作系列
 - 21 職業傷害系列
 - 22 台灣女婿系列
 - 23 各國風俗節慶系列
 - 24 節目對於外籍配偶及其家庭影響的介紹
-

* 括號中所列之各黨政單位，均為該系列之資料與規劃提供者。

《台灣媳婦》有高度配合政令宣導之色彩，如教育部、內政部、內政部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台北市民政局、民進黨婦女部等，均常藉由該節目進行政策宣導、法令介紹與機構宣傳等。此外，《台灣媳婦》2005 年首度於華視電視公司播出時，搭配之廣告內容也多為行政院、內政部的政令宣導，或教育部、新聞局推薦的音樂、教學出版品等。

除了三個主要節目目的與四個文化脈絡背景外，本文也嘗試進一步分析《台灣媳婦》節目中，最具代表性的論述與其代表之文化意義，並整理出六種主要論述類型（見表 2），而這些論述類型也確實呼應或反映了前述的節目目的與文化脈絡背景。

表 2：《台灣媳婦》六種主要論述類型

論述名稱	定義與例子
忍耐與利他	<p>強調台灣媳婦需要「不求回報」及「犧牲奉獻」，如：</p> <p>處處往好的地方想，就算公公婆婆也許今天脾氣不太好，說了妳一句、罵了你一句的時候，千萬不要頂嘴，稍微想一下：我有沒有惹他生氣了？稍微忍一下，是不是一下子事情就過了。(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7.01.29)</p>
強調台灣傳統性別角色	<p>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而照顧家人為台灣媳婦的本分，如：</p> <p>坦白講，有些台灣的男性為什麼要娶外籍新娘？有些是爸爸媽媽年紀大了，行動不便或者有慢性病，需要有人來照顧，所以當外籍配偶來到這裡當了台灣媳婦，這些重任就落在媳婦的身上了。(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26)</p>
文化同化論	<p>強調外籍新娘應早日「融入」台灣的文化與習俗，儘快學習中文、熟悉台灣風俗習慣、放棄母國文化等。如：</p> <p>希望讓我們的新移民非常快的融入家庭、融入社會，比如過年的時候，學烹飪、大廚教道地的台灣菜，希望她們能夠獲得公婆貼心的喜愛。(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30)</p>
展示性「多元文化」	<p>強調多元文化主義，但主要做法是展示節慶禮俗、穿衣吃食等，偏重展演性、活動性與較表面的文化，如：</p> <p>民俗活動我們辦過泰國的潑水節，越南因為跟台灣沒什麼兩樣，過年同樣的時間，好像沒有比較特別的節日。我們再來辦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例如：「國際新娘」，把所有的外籍配偶集合在一起，讓她們各自辦她們自己的「表演」活動。(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30)。</p>

表 2 (續)

論述名稱	定義與例子
增加外籍配偶生活權能	<p>提供外籍配偶有利的法律或是日常知識,以增加生活權能。如：</p> <p>取得居留證都可以到就業服務站來，我們做工作推介或安排職訓。我們會要知道說她在自己的國家裡曾經做過什麼工作，會什麼東西，在台灣有學什麼技術，做工作的媒合；如果沒有工作技術，可以透過職業訓練的方式。(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8.11)</p>
鼓勵對於外籍配偶的理解與接納	<p>希望也鼓勵家人、鄰居與社會能誠心接納新移民。如：</p> <p>其實如果當婆婆、先生的都會想說，人家這樣一個小女生，這樣養……養這麼大，嫁來我們家，也是來幫助我們家的，如果都是用這樣的心態，去對待媳婦，像楊媽媽所說，在經濟許可的情形下去幫助她的娘家，她真的可以很安心很安心的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8.09)</p>

相較於國外的跨國社群媒體，從《台灣媳婦》的文本內容與主要論述的分析當中，可以發現《台灣媳婦》的一個重要面向，即更為強調傳統性別分工與性別角色扮演。不過，本文重點在於跨國社群媒體所帶來的文化同化、抵抗、整合或其他影響，因此性別議題暫先略過。^[4]

二、《台灣媳婦》的文化同化論與閱聽人反應

《台灣媳婦》的文本中，明顯充斥著同化論的立場，如下例所示：

主持人：人不管在什麼環境，都要想辦法適應它，就像我們一樣，從小在鄉下長大，來到都市就要學著與人相處，不只是家裡的人。(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04)

民政局：「日久他鄉即故鄉」，我們希望她把台灣真的當成故鄉，然後發生非常濃厚的感情，因為愛妳的先生，然後愛你的家人，也愛這塊土地，然後希望非常快的能夠**融入**。（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30）

《台灣媳婦》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幫助東南亞配偶與大陸新娘早日適應台灣社會，並視台灣為真正的家鄉，因此，「同化」的政治與文化目的非常濃厚，節目內容也出現價值與風俗、飲食、語言與文字等多種同化論述。

（一）價值、風俗要同化

《台灣媳婦》文本強調台灣價值、風俗的重要性，並呼籲外籍配偶應儘速融入這些價值與風俗之中：

民政局：希望讓我們的新移民非常快地**融入**家庭、**融入**社會，我們很多課程的規劃，就是逐年在調整……最常辦的是……台灣的民俗，比如過年的時候，那些，讓她知道，才**不會婆媳之間衝突**……學烹飪、大廚教道地的**台灣菜**，希望她們能夠獲得**公婆貼心的喜愛**。（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30）

節目一而再地提醒，要能了解台灣的習俗，婆媳之間才不會衝突，因此外籍配偶只要照著學、照著做，不要質疑；亦即放棄原有的習慣、價值與信仰，儘量壓抑自己的不習慣與不適應，才能加快融入台灣社會的速度。如：

菲籍配偶：我覺得婆婆不是很喜歡我……有時候她的意思應該是「你們的傳統〔天主〕跟我們的傳統不一樣」。（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05）

大陸配偶：在大陸〔哈爾濱〕，家務都是夫妻共同分擔，有時候，可能老公力氣多一點，做得多一點吧！來到台灣就好像經常聽人家講說：家務事要女孩子做。

主持人：那你老公呢？

大陸配偶：我老公他是南部人，所以他很傳統。（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23）

主持人：人不管在什麼環境，都要想辦法適應它。（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04）

對於這樣的論述，顯然難以說服所有人。有些越南配偶就認為，自己的習俗應該受到尊重：

人嘛！都要有一個自由嘛！這是「人」嘛！不是我們外國人嫁過來就怎麼樣、怎麼樣，這樣不行啦！你們對我們好，我們也對你們好嘛……台灣人跟我們國外的不一樣，差很多。我們只有「一」〔強調〕個人！然後欺負我們，這樣受得了嗎？是不是？你們要我們尊重，也要尊重我們。（編號3）

「如果宗教信仰不一樣，公婆會不喜歡」的類似論述，迫使新移民必須放棄自己的文化、信仰，努力適應台灣文化。然而，強迫同化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如 Kymlicka（1995）指出，文化是人進行選擇的主要脈絡，每個人都是經由文化連結到所屬的位置。文化提供自我認同與尊嚴的支持、附屬感與相互的責任感，促進平等的方式應是依據每個人的不同需求，給予相應之對待。

不過，從《台灣媳婦》的文本設計看來，顯然並不支持文化差異，甚至是要抹平差異，並且是以台灣文化為本位優先。事實上，有些越南新移民對於台灣的民俗，比如農曆春節，就覺得過程十分麻煩，而呈現抗拒與「反抗式」文化反應：

很累、很累，要買這個買那個，要煮要拜的……有時候會忘記要拜什麼樣？（編號 7）
台灣的民俗我沒興趣！所以拜拜都是我婆婆在拜。（編號 19）

有些越南新移民覺得想得到認同、進而被接受，因此呈現「協商式」閱聽：

我想我多學一種東西，你就會對我比較好啊……我嫁來這邊都要跟你們都一樣的啦！跟台灣人相處，剛開始有一點壓力，接下來就努力的學習。（編號 24）
就是強迫自己要習慣，因為你活在另外一個國家了，必須要跟著他們，跟著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不然就會造成很多不滿意的……家人不滿意，然後別人又覺得你怪怪的，怎麼會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帶來這邊呢？你一定要想辦法適應環境啊！那這個我們也懂的。（編號 1）

「強迫自己要習慣」表示非自願或非樂意選擇，而是受社會現實所強制，不得不壓抑自己放棄原本的文化、認知，甚至是信仰與價值。依越南配偶切身的經驗來說，只覺「非習慣不可」，以加速自己文化同化之速度。

（二）飲食要同化

飲食往往是跨國社群普遍面臨的困擾，在《台灣媳婦》節目中，也有很多外籍配偶面臨飲食上的困難：

越南配偶／阮清嬌：麻油雞到現在還沒辦法吃。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還是要練習，因為我準備生第三個。（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04）

關於「麻油雞」這個問題，幾位接受訪談的越南配偶都頗有共鳴，
例如：

他們說吃那個〔麻油雞〕對我們的身體比較好，可是我們剛
嫁過來，我們不敢吃，我們就喜歡吃那個越南的口味，像豬
排骨我們剁成小塊去煮，放魚露、胡椒粉，煮鹹一點點，煮
乾的，我們坐月子真的很想很想吃，可是你們台灣不給我們
吃這樣子，叫我們吃那個「麻油雞」，吃那個我們吃不下飯
啊。(編號 24)

為了適應台灣食物而需要不斷「練習」的外籍配偶，還要扮演家庭
中負責掌廚的角色，以討公婆歡心：

菲籍配偶：我覺得婆婆不是很喜歡我……我做東西，她不喜
歡，她不吃；然後我慢慢學，然後慢慢知道怎麼樣，因為沒
辦法，她是我的婆婆。(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05)
主持人：所以媳婦做得好不好，婆婆是很重要的關鍵，婆婆
教你煮菜時，要認真學，有機會時就大顯身手。(華視《台
灣媳婦》節目，2006.07.21)

節目不斷介紹台灣食物的烹調方式，這些本地人認為可口的菜色，
在新移民眼裡未必感同身受，但她們卻被期待接受它，甚至學會它，以
討好丈夫、公婆與家人。多元文化強調每個人不但需要有選擇的自由，
也需要文化之孕育與發展，使新移民能學習到選擇的價值和意義，以及
提供不同族群有充分的選擇脈絡與文化資源（王俐容，2004）。因此，
有些越南新移民對於《台灣媳婦》文本，出現抗拒的反應：

因為我本身都會煮菜啊，家裡吃飯都是我在煮啊！那個煮菜

，教歸教啊，要看自己肯不肯做而已。像我煮東西我不用去學，看那個是……有時候看一看覺得滿無聊的。(編號 14)

有些則強調學些台灣菜也不錯，但混合越南口味則更佳：

台灣菜我也會一點啦，我吸收了一些與越南口味綜合，譬如有些菜，台灣的作法不好吃，我們改個方法，煮得不一樣，如「涼拌」我做越南家鄉口味的，他們說很好吃，他們說單純的台灣泡菜不好吃，我作的泡菜好吃！（編號 11）

至於是否要努力去學台灣菜，則有受訪者直接表示：

不會，因為我根本不喜歡煮啊！（編號 16）

許多越南配偶對於自己如何坐月子、坐月子吃什麼，是被迫且無選擇餘地的，而《台灣媳婦》文本並未支持多元文化主義強調的選擇自由，更未提供選擇所需的文化資源，僅不斷宣稱為了讓外籍配偶融入社會，必須配合並「練習」吃麻油雞等台灣食物，明顯背離多元文化主義標準，反映該節目是以社會及文化同化的企圖，作為優先考量。

（三）語言、文字要同化

為了保存多樣的語言文化資產，以及外來移民的文化身分，歐盟自從 1983 年起，採取兩種方式積極支持各地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一方面補助都柏林的歐洲少數語言辦公室（The European Bureau for Lesser Used Languages, EBLUL），另一方面則是在 1983 年至 2000 年，補助推廣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計畫（張翰璧、吳鯤魯，2003.11）。反觀台灣移民語言政策，卻是僅強調新移民必須適應主流文化，儘速加強本身的中文能力：

主持人：外交部相關規定，面談時間與人數的限制，或者要會說中文，否則可能就把你「駁回」等。（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9.06）

主持人：中文是最基礎的溝通語言，字也是一樣，你不認識中文字就很難出去，不管去那裡或買什麼，通通不方便。只要認真學中文，對自己都很方便，對整個家裡都很有幫助。（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04）

台灣社會常常將跨國社群同化困難之原因，歸咎於移民自身能力不足。在充滿標籤化、歧視、又抑制社會參與的情形下，社會正不斷削弱、壓制跨國社群（歐、美、日等第一世界國家移民社群除外）與其文化能力，使之不得不同化於台灣主流社會。《台灣媳婦》文本也顯露出此一企圖，除不提外籍配偶的母語使用權遭忽略排斥、政府政策無意提供任何保障外，更重要的是，對於新移民第二代是否應學習外籍配偶母語、政府應否提供相關學習資源等，節目在態度上更是刻意消極與忽略。

因此，越南配偶在語言同化壓力下，發展出不同之觀感。有些配偶爲了第二代，願接受學習中文的迫切性：

為了小孩嘛……要給他尊重我們，才教得動他。因為我看很多小孩子，然後媽媽不學嘛，什麼都不懂，然後問小孩，小孩說：「媽媽，妳怎麼那麼笨啦！」所以我不想這樣！（編號3）

學習中文是一定重要的，因為有時候可以教小孩啊，小孩不懂的話，你可以教他啊，住這邊的話，小孩子長大也辦法跟人家溝通、在社會生活啊！（編號14）

有些越南配偶感受到此一「強制性同化」，而強調使用不同語言的權利：

我認為用國語或是越南語教育小孩都可以，你看現在國語、台語，你看現在為什麼都可以講台語，以前為什麼只能講國語？現在英語都有人學習啊、日語啊。(編號 10)

更有人反抗「中文優先」之論述，指出不只是小孩，連老公也應學會越語：

不只我小孩，我老公我也會教越語，我認為這也是一種公平……我願意學你的國語，因為想辦法跟你及你身邊的人溝通，所以我也希望你也要懂得基本的越文，比如遇到我的爸媽，你懂得怎麼說：「爸爸媽媽好」，或是打電話來，你也會說「爸爸媽媽好」，或「請等一下」。然後小孩更重要，再怎麼樣也要帶小孩回鄉下，小孩學習多一種語言是多好的。(編號 1)

回歸歷史來看，多元文化主義是在近代族群衝突與新興社會運動抗爭中成熟，婦女、同性戀團體與弱勢族群等，抗議主流團體以所謂的普同標準規範壓抑他們，並批判社會對其之貶抑或排斥，要求公共領域應正視差異，給予差異的權利保障。回頭檢視《台灣媳婦》，節目中只有「中文輕鬆學」、「媳婦說台語」單元，卻未有越南語、印尼話或是泰文的學習資源或指示資源管道，提供予台灣媳婦的配偶及第二代，亦從未表示應該有此需要；但不少受訪者均談及對媒體內容的此一需求：

我希望能播越語教學節目，因為我們在台灣語言的環境下，不知如何開口教小孩，需要有專業的教學者錄製教學帶。(編號 1)

中文是重要的、越文也是重要的……因為我是越南人嘛，一定要教他。多一個語言，也不是壞事啊！（編號 3）

在台灣，即使越南籍母親想要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使用越語，依然面臨許多困境：

我也是一樣有教他，可是之後我要跟他講越南話，他跟我講國語，教了他，他會忘記，因為環境的關係，公公婆婆都跟他相處比較久，他們都講台語，我也較常跟他講國語了，很少講越南話……教他越南話有的他會講，有的不會講，他說：「那個字好難！我不學！」（編號 12）

孩子不認同母親的語言或母親教來困難，都使得新移民感到無力，在這樣強勢的語言同化環境下，只能被迫快速學習。

對節目所呈現的同化論述，上述三項分析顯示，台灣跨國媒體內容仍傾向文化同化論立場，要求外來者迅速接受台灣價值、民俗、飲食與語言文字，以早日融入台灣文化，但此一以社會現實為威脅的強制同化論，並不能讓新移民心甘情願地接受，部分呈現抗拒的態度，甚至不悅的感受，有些充其量只是「協商式」反應，順應著社會大環境壓力所為。另外，《台灣媳婦》的文本，反映了華視官方、社會主流價值，以及政府的同化企圖，態度上也不希望讓新移民有文化選擇的自由，甚或暗示著新移民的文化自由將造成家庭、社會衝突；而其他相關的問題，諸如文化差異、生活與社會不平等的狀況，則刻意被忽略。

三、《台灣媳婦》「展示性」的多元文化及我族中心主義

《台灣媳婦》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重要性。為了鼓勵對於文化差異的尊重，也為了增加對於東南亞國家的理解，《台灣媳婦》介紹了新移民其母國的特殊活動、節慶禮俗、穿衣、食物等，但多侷限於「展示性」目的，屬於較表淺的文化認識，只將移民母國的傳統文化儀式當作奇風異俗來介紹，忽略了這些文化儀式背後社會歷史脈絡，未真能深入理解各文化的核心價值。因此，表面上雖是介紹多元文化，但往往只是

強化了「台灣就是跟他們不一樣」，不一定有利於彼此的了解與包容；許多活動經常是把人集合在一起，熱熱鬧鬧地玩一玩，或看看服裝展覽、吃吃南洋食物，然後散去。

(一) 展示節慶禮俗

節慶禮俗的介紹是最常見的，例如：

越南配偶／阮氏娟：越南過年貼春聯、[發]紅包是中國影響的。越南的過年也是農曆一月一日，習俗上也要送灶神。但不同的是：送完灶神後，馬上去掃墓，如同祖先與我們一起過年。(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9.13)

(二) 展示飲食

在專門介紹新移民母國文化的主題中，「食物」似乎較受製作單位青睞，《台灣媳婦》介紹展示的食物包括泰式咖哩、檸檬魚、涼拌海鮮冬粉、越式什錦蛋餅等。

越南配偶／阮氏娟：越南的咖啡味道很香、很濃，有點苦帶甘。泡咖啡時，杯子內的咖啡與水的量控制好。採的時候，成熟度也很重要，炒的功夫也重要，炒太過頭也不好，火候不夠也不行。(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9.13)

(三) 展示觀光休閒

「觀光休閒」也是新移民母國文化主題的重點內容之一，吸引觀光的民族舞蹈、傳統戲曲、文化展演等，都較易成為介紹重點。

越南配偶／阮氏娟：越南也有歌仔戲、木偶戲，沒有皮影戲，最有特色的是「水上木偶戲」；人沉在水裡，加些管子呼吸，另外有人配音。(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9.13)

總括而言，《台灣媳婦》所呈現的「展示性多元文化」，經常是一些未深入文化核心、蜻蜓點水式的介紹，不是節慶禮俗、食物、觀光休閒，就是飲食、氣候，對於原生社會的價值、觀點、歷史、民情等，則較少關注。這樣的介紹方式是否有助於台灣社會了解東南亞國家？多數的越南配偶並不覺得有正面助益，直言道：

這樣有幫助越南人來台灣的生活嗎？不可能！煮個越南菜，穿個越南服、印尼服不是重點。(編號 10)

曾經親身參加類似活動的外籍配偶則說，穿著傳統服飾展示給別人看，感覺很不舒服。換句話說，外籍配偶在此成爲「被觀賞奇風異俗的文化他者」，內心的不適感可想而知：

叫我們穿那個傳統的越南服，真的很累！因為它很長，做什麼事都不方便，而且我們來這邊也不是每個人都帶來，因為來這邊根本沒人用到它啊！穿那個給大家看心裡感覺不是很舒服，辦活動可以，不要叫我們穿那個。(編號 24)

(四) 我族中心主義

隱藏於「展示性多元文化」之後，常常讓越南配偶感到難受的原因，來自《台灣媳婦》文本流露的我族中心主義與民族優越感。節目中經常會以台灣觀點出發，衡量東南亞國家狀況，並作出「落後」的評價：

越南配偶／林金惠：南越也很少有颱風，北部較多。如果風稍微大一點，屋頂就飛走了，因為房子是以草木蓋的。(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9.13)

越南配偶／陳蕃玲：我從小就住在用草蓋的，沒有像我們這邊〔台灣〕蓋的這個這麼堅固，我們的房子要一直換，一年

、兩年就要花錢，因為是用草、然後大家編的，如果像這邊的颱風就吹走了，就不見了，雖然〔越南〕沒有颱風，但一年有六個月下雨，下雨就壞掉。（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10.25）

然而這樣的描述是否合乎真實？從本研究受訪者的回答可知，事實未必如此：

哪有這樣，我家就不是，用草蓋的怎麼住啊！（編號7）
有，但那是三十年以前了，以前戰爭，房子被炸掉了，所以沒有準備蓋好的房子，就蓋草屋。（編號8）
播這些內容有什麼用？只是讓人家覺得越南為什麼那麼窮？對於提升對越南的了解一點用都沒有，只是讓人更看不起越南！（編號1）

在台灣，對於外籍新娘與其原生社會的主流論述，無論是種族、階級（在台灣為中下階層，在世界則為邊陲或半邊陲）、經濟或社會文化等面向，多為差異描述，極少有真正關注、嘗試理解，乃至肯定其原生國社會文化價值之報導；同時，主流論述經常以台灣本位的優勢心態，將其原生國社會文化，歸類為「落後」、「無知」、「未開發」的邊緣位置，使「差異」不斷被複製、鞏固，意在彰顯本地民族的自我優越。這樣的媒體內容往往傷害到越南配偶的感情。

因此，越南配偶不斷呼籲，希望媒體能夠製播一些好的、深入的、真實的內容，還給閱聽眾一個較正面的「越南形象」：

我覺得我的國家很強，你看歷史以來，多少國家要搶走我們的土地？像中國、法國，甚至連美國也來打，但都沒有成功，我們還是屹立不搖……要播這些好的啊！（編號1）

媒體是承載多元文化的主要工具，多元文化主義的媒體政策應提供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个人一種有意義的選擇，如此少數群裔與少數社群既不會被隔離在社會邊陲地帶，也不會被強迫同化於主流社會，而能有表達意見之管道，呈現各種不同聲音。

四、認同的選擇與困境：「台灣媳婦」與「新台灣之子」？

《台灣媳婦》文本不斷鼓吹外籍配偶早日融入台灣社會，成為真正「台灣媳婦」，然而，各種跨國社群之認同理論均指出，目前跨國社群傾向「多中心、多重、不穩定、沒有被定位，而能夠被不斷賦予新意義」（Faist, 2000: 198）的文化認同方式，並期待維持多重認同的可能。相對於台灣政府希望「台灣媳婦」真的成為台灣人，快速地被同化，產生本地認同，新移民的感受又是如何？

（一）認同的選擇：我是越南人，還是台灣人？

面臨強大同化壓力的外籍配偶，往往有著難以選擇的認同困境，她們在台灣雖然已經有了新的生活與家庭，卻依然無法割捨越南的認同，因為越南是她們最親切的家鄉：

我是越南人就是越南人。(編號 16)

雖然家人對我很好，但我永遠是越南人，因為那裡有我最熟悉的語言、最熟悉的人情。(編號 1)

如果台灣人問我，我也會說「我是越南人」。不管怎樣，永遠也不會改啊，就是我的媽媽在越南，我的祖先也是在越南啊！（編號 24）

認同來自於血緣、文化，沒有人可以選擇在哪裡出生；基於血緣、出生地等因素，即使拿到身分證了，新移民在心裡仍偏向覺得自己是原生國家的人（張秋芬，2006）。

我還是覺得我是越南人，我這樣講我老公會不高興，但是我還是這麼覺得啊！我常跟他講，如果我今天不是越南人，他們〔家人〕就不會這樣對待我了。姪女每個星期都帶一大堆衣服給我洗……質料好的不能用洗衣機；在要拜拜的日子，我要幫小姑們的家庭準備一份拜拜用的食物。(編號3)

但也有些越南配偶希望被「承認」為台灣人，而選擇自己是台灣人的認同：

我常推著娃娃車出去跟人家聊天，別人說：「妳是越南來的喔！我還以為是本地人呢！」我就很高興。(編號2)

我想當台灣人，因為孩子在這邊，我也還要在這裡養他，等我拿到身分證，我就是台灣人了。(編號12)

我在台灣生活已經習慣了，回去越南只有一點點時間就回來了，要我再住越南，我已經不習慣了。(編號11)

我是台灣人，因為我嫁來這邊，就是我要跟我老公、跟我的小孩相處了，那邊是也有想一點點，可是**不管怎麼樣**，永遠是在台灣了啊！**不管怎麼樣**，我也不回去啦，因為我外公外婆說：「女人嫁出去，就是水潑了！」妳永遠是他們家〔的一份子〕了啊！要回越南，也是一會兒就回來，不可以跟他們住在一起了。(編號24)

在「編號24」的談話中，出現了二次「不管怎麼樣」，顯露受訪者內心對原生認同的渴望，然而在環境現實下，卻有不得不放棄的無奈。Hall (1992) 指出，人們在不同程度的壓力、誘因或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認同，但認同絕非固定不變，而是一個片段與變動的過程，是使用歷史、語言以及文化資源以「變成」(becoming)，而非「是」(being) 某一特定主體的過程。

我在那邊出生，也是越南一份子嘛，也不能說嫁過來這邊就全部變成台灣人啊！……心裡面喔，一半一半啦，在台灣就台灣人啦，回越南就越南人啦！（編號 7）

「在台灣就台灣人啦，回越南就越南人啦！」此種身分的覺察與反應，可以說是個人在社會情境上的即興演出，任何身分均潛藏資源或障礙，具有潛在的利益和成本考量，一般也稱為「境況論」（*situational identities*）。Ajrouch & Kusow（2007: 75-76）便強調，認同的形成並非個人的選擇，常常是社會關係的結果；認同往往因應周邊的人所給予的訊息與態度，而不斷地轉換與調整，特別是對於跨國社群而言，當下所存在的社會與族群關係，以及原生國家的環境，都可能影響認同的內涵與建構。此一境況論的觀點，主張認同是多變、可被利用的，也是隨情勢變化而定的；如同 Vertovec（2001）所言，當代跨國社群中，個人或是團體的認同，都是由超過一個地方或一個國家以上的社會世界協商決定，也因此，認同在當代社會呈現了較高度的變動與不穩定特質。

（二）認同的困境：我不是台灣人，也不是越南人？

在《台灣媳婦》的文本論述中，認為外籍配偶應儘速融入台灣文化，但其表露的我族中心主義，卻對於外籍配偶建立其文化認同或台灣認同，產生很大的阻礙。Fanon（1992）曾分析黑人如何成為白人眼中「他者」的過程，指出：黑人被迫從主體成為客體，去「發現」黑人性（*blackness*）與種族的特色，被迫成為低於白人的他者。同樣的，外籍配偶在台灣我族優越論述中，被建構為他者，自我的認同受到壓抑而產生混亂與困惑。受訪者指出：

上次有一個客人問我老公說：「有沒有拿到身分證？」我老公說：「有！她已經是台灣人了！」〔但〕他說：「我還是認為她是越南人！」（編號 14）

我們講也沒有用，他們根本沒有把我們當台灣人，如果他能接受我們是台灣人也很好啊，但這個是不可能的。(編號 5)
我不知道，我是越南人，但我嫁來台灣……我有時候也搞不懂。(編號 15)

現在嫁過來這邊就完全不一樣了，怎麼講，我們那邊的國籍也沒有，什麼都沒有了，心裡想是越南人，想來想去，可是我現在國籍又沒有，不曉得怎麼感覺才好。可是台灣人又不當我們是台灣人，又當我們是越南人，所以……(編號 5)

文化沒有上下優劣之分，只有差異之別，台灣社會與媒體對新移民原生國家進行「落後」的再現與描述，深深影響了新移民自我文化認同的意願。她們愈與台灣人互動，愈無法認同自己的文化與社群：

我們越南那麼窮，很丟臉介紹自己的文化。(編號 1)

嘻！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我是越南華僑。我們祖先是中國人。(編號 8)

有時候人家說：「越南妹！越南妹！」我就感覺很不爽！（編號 14）

同化主義要求移民或少數族群融入其移入社會的主流文化，然而，在充滿偏見與歧視的現實狀況下，移民或少數族群所面對的，卻是難以同化（inassimilable）的艱辛過程。一般而言，新移民在媒體發聲的機會不多，生活中又深刻感受到台灣人對自己的歧視，因此部分新移民在心理上，不願承認自己的來處，乾脆稱自己為「中國人」，想藉此表示自己與大多數台灣人一樣，至少在三百年前是同一個根源，顯示其期待被主流「承認」的渴望。不過，也有一些越南配偶既無法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找不回原生的國家社會認同，出現被邊緣化的心理及文化危機，走入一種認同困境。

(三) 認同新問題：爸爸是台灣人，孩子就是「新台灣之子」？

相同問題也出現在外籍配偶的下一代身上。雖然台灣主流社會聲稱新移民第二代為「新台灣之子」，但這群新台灣之子，其實同樣背負著成為「他者」的重擔。例如坊間常見有關「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新台灣之子教育堪憂」等議題探討或新聞報導，而這也造成新移民女性的反彈：

怎麼會有問題呢？台灣與我們那邊教小孩也是差不多啊！我看台灣小孩跟外籍的小孩沒有什麼不同啊，現在小孩子都嘛不乖、不聽話，也不是只有我們外籍的小孩才這樣子！如果他講外籍的小孩會造成很多問題，那我想搞不好我們的小孩還比台灣的小孩還乖呢！（編號 24）

我看他們的小孩每天回來都不乖啊，都不聽媽媽的話啊，在那邊玩東玩西，他媽媽叫他，他也不聽啊！我看**我們**的小孩比**他們**好多了（編號 10）。

眾所周知，教養小孩逐漸成為所有台灣父母頭疼的問題，並不只有外籍配偶正面對如此困境，所以站在族群本位主義立場來強調外籍配偶管教不周，往往讓她們感到不公平，也造成生活適應上的問題。一位受訪者表示：

我就很想帶小孩回越南，人家不喜歡我，我待在這邊沒意思。（編號 7）

平心而論，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若未能受到婚配家庭公平對待，再加上本地社會的歧視氛圍，那麼返回原生國教養第二代，本是可以考慮的選項。但台灣提供社會協助之基金會，有些依舊傾向勸導外籍配偶將孩子帶回台灣，因為孩子是「台灣的」小孩。

某基金會：我們在帶回這些孩子之前，確實花了很多功夫在說服台灣這邊的家庭及越南的阿公阿嬤；這過程中，有些媽媽就會反反覆覆，因為她覺得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克服……所以她有很大的掙扎。我們一直在鼓勵她帶小孩子回台灣，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華視《台灣媳婦》節目，2006.09.14)

對於「爸爸是台灣人，孩子就是台灣的小孩」的說法，越南配偶也有不同意見：

我們的小孩身體內流著一半越南的血，所以當然也可以說是一半的越南人。(編號 16)

在越南〔，物質〕生活雖然比台灣生活低，但我們的感情比較好……小孩子要跟著媽媽比較好，畢竟在台灣真的〔有人〕會好好的照顧他嗎？還是只因為希望有一個下一代才要這個小孩？……他媽媽照顧他是全心全力的、集所有的心力，但他爸爸照顧他是基於一種「責任」。(編號 1)

就新移民女性而言，孩子在越南給家人照顧，親情的關懷不虞匱乏，應該比台灣的保母照顧更具保障；換言之，當異國婚姻無法維持時，小孩不應只能留在台灣，母親也有教養權利。很顯然地，「爸爸是台灣人，孩子就是台灣的小孩，應該留在台灣」的論述，無法獲得外籍母親的同意。

柒、「文化同化」與「文化整合」媒體

Riggins (1992) 指出，主流媒體經常忽視對跨國社群的報導，或將跨國社群視為社會問題，因此，想要維護其文化認同與權利，有賴於

新的、小眾的跨國性媒體出現。當台灣社會出現跨國通婚的情況日益普遍，爲此一新興跨國社群——「外籍配偶」提供文化資源的新媒體，確有存在之必要，而《台灣媳婦》節目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製作播出。但必須注意的是，跨國性媒體往往有兩種立場，一種是「文化同化」，擔負主流社會同化新群體的文化政治意圖，另一種則是「文化整合」，主要提供抵抗文化同化的能量。

Caspi, Adoni, Cohen, & Elias (2002) 研究指出，整合的意義在於一個社會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緊密地連結成爲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的基礎，是不同群體能夠在價值、意義結構上，受到所有社會成員的相互承認與分享。也就是說，整合的意義在於彼此理解、接受差異、富饒的共存、相互的學習。因此，文化整合不同於文化同化，文化同化強調一個次團體需要去接受、適應其他主流社會的價值與認同方式，是一種單向的溝通。

Milikowski (2000) 比較兩種不同的媒體表現後，認爲採行「文化同化」概念運作的媒體，雖有影響多數族群及少數族群關係與互動的潛在能力，但單向式的溝通，更常常讓少數族群加倍隔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相反的，較具「文化整合」能力的媒體，則有可能提供少數族群更多的自主性，以維持他們的文化資產，並且更爲重視文化認同的問題，提供其與原生國家文化連結的可能，或是提供一個能夠共同溝通的平台。

從上述《台灣媳婦》的文本，顯示出該節目傾向於文化同化的立場；節目內容鼓吹不同國家的外籍配偶去接受、適應，甚至「忍耐」台灣主流的觀點與價值，但這只是一種單向的文化溝通，即是要外籍配偶理解並學習台灣的文化。此外，《台灣媳婦》的文本雖然嘗試增加台灣民眾對於東南亞國家的認識，但因其著重「展示性」的多元文化呈現，並無法提供人們太多深刻或有意義的了解；相反的，其中隱藏的我族中心主義與民族優越感，卻很容易造成外籍配偶的挫折感與傷害。

進一步從文化認同的建構切入分析：站在文化同化的立場，少數群體必須服膺於多數的認同方式，放棄自己原有的族群認同；另一方面，

站在文化整合的立場，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的認同應該相互對話、調和，並在整合的過程中，泯除原有明顯的族群特質，建構出一個共享的認同，如「雙重認同」(dual identities) 或「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 的模式，而放棄原有的單一、同質性的認同。就文化整合而言，首先可從「混雜」(hybrid) 的位置出發，讓每個團體成員可以一方面保有自己的認同，一方面也成為社會共同認同的一份子；再者，面臨兩種不同文化時，少數團體成員可以吸收不同文化的元素，發展出新的混雜文化與多重認同 (Caspi et al., 2002)。

以文化同化為目的的媒體，往往要求新移民放棄原有的認同形式，服膺於主流社會的認同形式，反而導致了新移民疏離於主流社會。此外，由於在媒體上感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貶抑與否認，也影響了新移民認同自己原生國的意願，最後，形成了既不見容於當地社會，也無法回去過去原生社會的認同困境，導致「難以同化」的結果——這些狀況及發展，均可從《台灣媳婦》的文本與本研究訪談分析中看出。同時，《台灣媳婦》的文本蘊含著一種固定、僵化的族群概念，對於思考一個世界性的、流動性的、混雜性的新族群概念，並無助益；而《台灣媳婦》再現出來的意象，經常是靜置與固定的東南亞文化風貌，不斷重塑並強化著新移民作為他者的形象，形成新移民認同的困境，也造成《台灣媳婦》文本與閱聽人詮釋的明顯衝突。

換句話說，依循文化整合論的媒體，致力於摒除單一、同質性的認同，而鼓勵混雜、雙重或是多重認同的可能性。這觀點接近 Hall (1992) 提出以「新族群」(new ethnicity) 的概念來分析後現代社會混雜的族群文化。他認為所謂的「舊族群」(old ethnicity)，指的是立基於特殊政治與文化分析上的傳統種族論述，如黑人論述。在政治上，黑人論述與種族主義、邊緣化等共同經驗緊密連結，且這種經驗表現在不同的歷史、傳統與族群認同之中；在文化上，少數族群總是在文化論述中，被公式化為「不可說與不可見的他者」(unspoken and invisible other) (同上引：252)。亦即以舊族群觀點而言，「族群」這個語彙認知在建構主

體與認同的過程中，因其歷史、語言、種族及文化與相關論述之限制，呈現出靜置、固定不動的僵滯狀態（同上引：257）。

然而，新族群的時代卻接受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的錯置、重新組織與重新定位，亟欲打破血統與種族決定的僵固限制。新族群的觀點接受並擁抱更為多元而歧異的詮釋，並指出族群不能在缺乏階級、性別、性傾向的面向中被獨立地再現（同上引：255）。族群文化與認同總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脈絡下，不斷混合、對話、重整與再建構，相較於舊族群所呈現出的靜置、固定不動的定義方式，新的族群經驗顯示出一個「不穩定、再連結、混雜、切割與再混合的過程」（同上引：258），這種新的族群觀點更為開放、沒有排他性，較符合當今不斷在國家、文化邊界流動的族群的實際經驗，這也是文化整合論的媒體所要強調的立場。

Arnold & Schneider（2007）認為，文化整合論的族群媒體應該有兩個不同的層次：在國家層級上，當建立一個所有族群都可以近用、互動與溝通的族群媒體，以作為基礎；在地方層級上，需要一個地方媒體提供相關法令、資訊、政策的宣導，以協助少數族群的生活適應與文化整合。兩種層次的族群媒體將成為發展與維持文化認同的主要管道，也是協助文化整合的重要工具。再者，Arnold & Schneider 表示，無論何種層次的文化整合論媒體，都應有以下幾個重要特色：偏重關於價值、意義與認同的資訊與知識的傳布；支持文化與言語傳播的多樣性；降低社會距離與文化偏見；建立雙向的溝通。

如果從上述兩個層次提供政府與媒體相關的政策意見，首先，以台灣目前在國家層級上，已經存在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兩個族群媒體的狀況來看，可能較難再設立一個「新移民電視台」，但可以鼓勵、獎勵或補助一般電視台製播符合新移民文化需求的節目，另也應擴大客家電視台與原住民電視台的功能，賦予並增進它們作為所有族群互動溝通平台的功能，以吸引更多不同族群進行跨族群文化溝通、互動與學習。其次，在地方層級部分，應鼓勵各縣市政府利用地方有線電視頻道製

作新移民相關節目，以提供當地新移民在生活適應、法令資訊、行政資源上的幫助；例如桃園縣政府即利用有線電視提供的社區公益頻道，每天傍晚五點至六點製播外籍配偶特別節目，其中也包含半個小時的越南新聞節目，有利於越南配偶維持與其母國文化、資訊及情感上的聯繫。

至於在節目方面，文化整合論的節目應盡量以 Arnold & Schneider (2007) 的觀點為原則，在文本的設計、節目的構思上，支持文化與語言的多樣性，例如增加越南語、印尼語的內容，或協助第二代語言學習之教學等；在介紹不同國家時，也可以增加中性的當地新聞時事、社會訊息、文化與政治經濟介紹，致力降低社會、族群與文化偏見，避免以台灣本位主義的意識型態隨興批評，重視節目雙向溝通與族群溝通之功能，開放更多的機會讓新移民發聲，並與當地民眾、本地族群進行對話與相互學習。同時，應期望新移民媒體不僅針對新移民給予文化支持功能，也應將其他族群涵蓋於閱聽眾範圍，以增進不同族群間的文化溝通，作為一個跨族群文化學習與社會理解、整合的平台。

捌、結論

作為第一個為外籍配偶量身訂作的電視節目，對受訪的越南配偶而言，《台灣媳婦》有些部分是有用的，特別在生活實用性上，像是面臨家暴的處理方式、遭遇公婆家人不當虐待的求助管道、如何接觸識字班、如何爭取子女教養資源、移民法令的更動與相關權利介紹等。然而，就多元文化價值與社會整合來說，雖然華視官方宣稱《台灣媳婦》應具有溝通、學習、理解、同化與社會整合等不同的文化目標，但其文本內容分析結果顯示，節目仍著重在文化同化的意圖上，希望外籍配偶儘快適應台灣社會，接受台灣語言、文化、食物與習俗，具高度「文化同化論」色彩，並伴隨強烈的台灣我族中心主義與民族優越感，使許多外籍配偶在觀賞文本時，感覺到被壓抑、歧視與不平等，產生了反抗式解讀，部分並衍生為社會反抗情緒，此結果與該節目宣稱的社會溝通、理解

、整合等目標，產生了直接的衝突。Arnold & Schneider (2007) 已指出，整合必須建立在多樣共存、相互學習、彼此尊重，進而形成共識與共同價值的基礎上，因此從《台灣媳婦》的節目效果看，這樣的嘗試並不成功。

另外，節目文本經常流露民族優越心態，暗示東南亞國家之落後及與台灣的差異，對外籍配偶的感情與文化認同造成傷害與不利影響，加速其在台灣社會的「他者化」。部分受訪者因此出現認同困境，對兩方的認同均出現疑慮，或因被壓抑而失去自我文化認同之能力，產生了掩飾、偽裝自己原生種族身分之現象；另一些受訪者則在社會現實壓力考量下，放棄對原生國的認同或出現處境式的混雜認同，但卻因社會的歧視，依舊受困於「難以同化」的處境。因此，即使《台灣媳婦》一直強調著「多元文化的展示」，實際上卻無法達到多元文化主義維護多元認同的核心價值與目標。

《台灣媳婦》文本傾向於文化同化目的，並呈現強烈的我族中心色彩，造成大多數外籍配偶的反抗式閱讀，然而，此反抗式閱讀是否能蓄積足夠的文化抵抗能量？在《台灣媳婦》和主流媒體文本持續對外籍配偶原生文化加以貶低與客體化，以及社會歧視和社會現實等強勢因素主導下，新移民的文化認同與文化選擇出現了困境，部分新移民失去決定認同的能力，部分則屈就現實但卻依舊難以同化，而堅持單一原生文化認同者寡，且遭主流族群孤立、邊緣化與他者化，這些狀況均暫無有效解決之道。因此，現階段台灣跨國社群電視媒體的社會整合及文化抵抗效果，可說是十分微弱，其所呈現的是脆弱、不穩定、表面化及不民主的強制性同化，對新移民的文化權利與文化認同造成不利影響。

本研究結果回應、但也挑戰了跨國社群的相關理論。首先，跨國社群的重要特色在於認同的建構。在當代的跨國社群中，個人或是團體的認同，都與超過一個地方或國家的社會世界有關，呈現為一個反覆協商、甚或衝突的過程 (Vertovec, 2001)。從本研究對越南配偶的訪談中，的確顯示出她們經歷過反覆協商與衝突的認同過程，也反映出受訪者的

認同，因為社會關係的改變，而不斷在台灣與越南之間交錯與重整，呼應了「境況論」的認同特色——多重、混雜、隨著情境不同而改變。因此，本研究結果某種程度支持 Hall (1992) 所提出的「新族群」觀點，受訪者本身具有「新族群」的特色，影響其解讀方式更加地歧異與多元，挑戰了一元認同的文本建構。

再者，跨國社群的相關理論均強調與多國社會聯繫、互動的重要性，特別是媒體方面，除了能夠連結他們與原生國家的關係及認同，也提供了其他的角色，如協助跨國社群瞭解移居國的經濟、政治、社會領域。然而，目前台灣社會對於跨國社群的媒體需求與傳播權，其實是視而不見的。儘管高社會階級之跨國社群，例如來台擔任高階主管的歐美人士，可以直接透過網路來滿足自我的文化需求，或者觀賞、接收本地許多英語影視節目與英語文化素材，但對於本文所關注的外籍配偶而言，她們多半來自網路不發達的非英語國家，原生家庭的經濟、文化資本也不足，因此其傳播科技應用能力，相對而言是極度缺乏的，想要藉由媒體來維繫原有的文化經驗與認同，或是與原生社會做連結，也相較困難許多。

在此若以本研究結果回應跨國社群的理論，可突顯出目前跨國社群相關理論，過於強調經濟、語言與文化資源的優勢階級經驗，而忽略了弱勢的跨國社群之困境，亦即要經由媒體參與，培養多國的社會互動與多重文化認同，談何容易？不單如此，外籍配偶還得面對嚴重的種族歧視與經濟階級壓迫，更使得她們在文化認同上——不論是堅持原生認同、轉換至移居國之認同，或產生混雜認同——都遭遇到嚴峻的挑戰，並因此產生無法正常建立文化認同的危機。故就現實而言，真實遊走於文化、國家邊界，並不如跨國社群理論所呈現出來的單純輕鬆；在世界體系裡，不同階級位置的不同族群，所面對的認同問題與認同困境，也有極大的差異。

因此，本研究支持部分跨國社群研究的理論，強調文化意義的生產、傳達與擴散，必須附著於社會與象徵的連帶；而文化是能動的，需要

放在具有邊界的領土與特殊的社會空間下被考量。跨國社群其實具有複雜多元的樣貌，在不同社會脈絡下，不同社群的經驗也有高度歧異性。換句話說，跨國社群理論應該深入不同的社會脈絡、階級背景，從各種文化邊界與特殊的社會空間加以考量；唯有意識到跨國性文化無法在去邊界化的空間中生存與發展，才能更精確地掌握與解讀這些複雜的文化現象。



註解

- [1] 本研究選擇越南配偶進行訪談，主要原因是自 1996 年至 2007 年，內政部警政署資料顯示，越南配偶在台灣東南亞配偶中，佔有最高的比例，2006 年時曾達 64%（〈外籍配偶居留統計〉，2007.02.07），故選擇越南配偶進行訪談，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意義。雖然台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大陸配偶，但由於大陸配偶在文化與語言上，同台灣較為接近，文化差異不如越南來得明顯，因此，選擇越南配偶較能突顯出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與特殊性。
- [2] 由於節目內容可區分為烹飪教學、語言教學、婆媳與婚姻經營、台灣文化介紹、東南亞國家文化介紹等不同類型，原則上，每一類型都會請受訪者至少看過一集，避免因為節目內容差異而影響解讀。
- [3] 《台灣媳婦》播出時，雖然會指出該集的主題，但並未編列集數，因此在本文中，僅以播出日期來區分節目內容與來源。
- [4] 在訪談中，六種論述的文本均請受訪者進行解讀。其中，「忍耐與利他」、「台灣傳統性別的強調」較側重於性別議題，而「增加外籍配偶的生活權能」及「鼓勵對於外籍配偶的接納」部分，正面與反抗性解讀皆有，但由於其主題偏向社會面與生活面，與本文關注之文化認同問題相對較遙遠，故暫且皆不予討論。礙於篇幅關係，本文將側重於「文化同化論」與「展示性多元文化主義」兩種論述的解讀分析。

附錄

表 A：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年齡	學歷	來台年數	目前職業	先生職業	家中其他成員
1	25	大專	5	電子工程師	業務	先生、婆婆
2	26	高中	4	作業員	工	先生、一女
3	23	高中	5	修改衣服	文書	先生、一子、公婆
4	25	高中	5	工	工	先生、一子、婆婆、大哥、大嫂
5	25	小學	5	工	退休軍人	先生、前妻之子
6	25	小學	5	家庭主婦	裝潢	先生、二個小孩、婆婆、先生的弟弟
7	24	高中	4	家庭主婦兼攤販	攤販	先生、二個小孩、婆婆
8	50	國中	24	電腦公司	建築業	先生、三個小孩
9	34	國小	4	工	工	先生、三個小孩、婆婆、大伯
10	21	國中	1.5	家庭主婦	保全	先生
11	32	國中	7	技術員	專業性工作	先生、一子、公婆
12	30	國中	5	攤販	無業	先生、一子、公婆
13	36	小學	1	家庭主婦	生意	先生（受訪者懷孕中）
14	32	國中	6	生完二女後 回歸家庭	小生意	先生、二女、公婆
15	25	小學	2	家庭主婦	工	先生、公婆（受訪者為華僑，懷孕中）

表 A (續)

編號	年齡	學歷	來台年數	目前職業	先生職業	家中其他成員
16	29	國中	9	小生意	鐵工廠	先生、二子、公婆住在附近
17	26	小學	5	在家帶小孩	工	先生、二子、公婆
18	31	學歷不說	7	指甲彩繪	工	先生、二子、小姑
19	27	學歷不說	5	家庭代工	建築業	先生、一子、婆婆住在別處
20	22	高中	5	工	工	先生、沒有小孩、公婆住在別處住
21	31	高中	5	工	工	先生、一個小孩
22	25	小學	3	在家帶小孩	工	先生、二個小孩、婆婆
23	32	大學	3	在家帶小孩	電腦教師	先生、一個小孩、婆婆
24	30	小學	8	工	工	先生、二個小孩(曾與大哥、大嫂住)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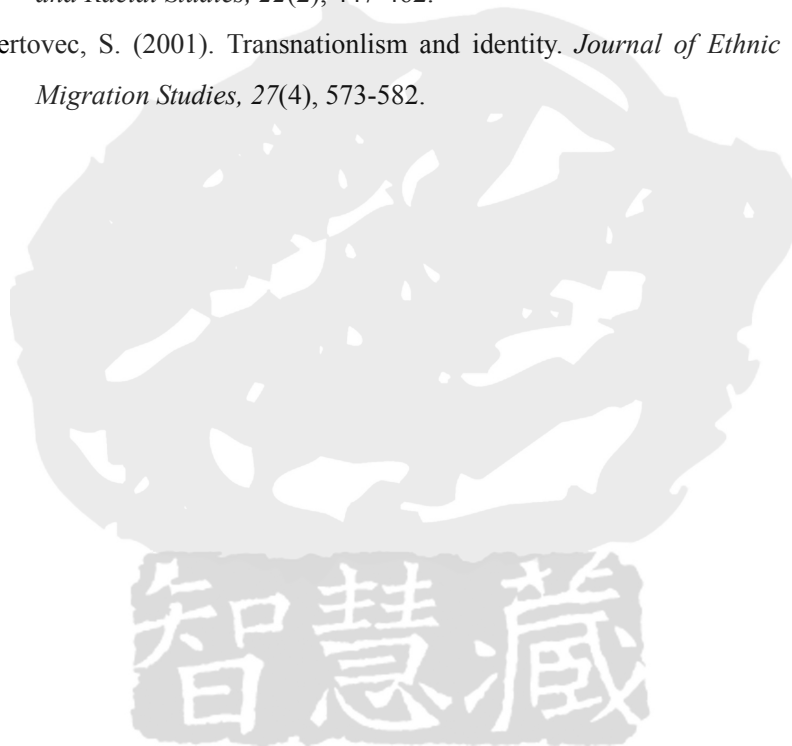
- (1) 訪談進行時間為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6 月。
- (2) 「學歷不說」者，乃為他校補校學生，可能因當時有八人在場，再加上學歷自認為不高，所以不願表露。
- (3) 除了外籍配偶外，本研究亦曾於 2007 年 1 月中旬電話訪問負責製作本節目的艾迪斯傳播公司約二十分鐘，以理解本節目的製作方向與背景。

參考書目

- 〈外籍配偶居留統計〉 (2007.02.07)。上網時間：2007年1月15日，取自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26930&ctNode=11395&mp=1>
- 王俐容 (2004)。〈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衝突與挑戰〉，「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走過台灣—世代、歷史、與社會研討會」論文。台灣，清華大學。
- 王嵩音 (2000)。《少數族群媒介之觀眾分析：以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節目為例》。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吳啓綜 (2005.05.03)。〈江霞當導演 力挺「台灣媳婦」〉，《民生報》，C4版。
- 張秋芬 (2006)。《看「我」、聽「我」—新移民女性的自我概念與族群認同》。台南大學教育學系輔導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翰璧、吳鯤魯 (2003.11)。〈文化公民權的政治經濟分析〉，「2003全球客家文化會議」論文。台灣，高雄。
- 孫治本 (2000)。〈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思與言》，38(1)：147-184。
- Ajrouch, K. J., & Kusow, A. M. (2007). Racial and religious contexts: Situational identity among Lebanese and Somali Muslim immigran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0(1), 72-94.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 295-310.
- Arnold, A.-K., & Schneider, B. (2007). Communicating separation? Ethnic media and ethnic journalists as institutions of integration in Germany. *Journalism*, 8(2), 115-136.
- Caspi, D., Adoni, H., Cohen, A. A., & Elias, N. (2002). The red, the white and the blue: The Russian media in Israel, *Gazette*, 64(6), 537-556.

- Faist, T. (2000).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and cultu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2), 189-222.
- Fanon, F. (199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Pluto Press.
- Featherstone, M. (1990). 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p. 1-14). London: Sage.
- Gillespie, M. (2006). Transnational television audiences after September 11.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2(6), 903-921.
- Grillo, R. (2004). Islam and transnationalis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0(5), 861-878.
- Hall, S. (1992). New ethnicities. In J. Donald & A. Rattansi (Eds.), *'Race', culture and difference* (pp. 252-259).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 Kymlicka, W.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ikowski, M. (2000). Exploring a model of de-ethnic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4), 443-468.
- McGrath, B. (2002). *Ethnic identity and media use among second-generation Korean-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 Florida.
- Portes, A., Guarnizo, L., & Landolt, P. (1999). Introduction: Pitfalls and promises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217-237.
- Riccio, B. (2001). From "ethnic groups" to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Senegalese migrants ambivalent experiences and multiple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7(4), 583-599.
- Riggins, S. (1992). *Ethnic minority medi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hi, Y. (2005).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ethnic media use,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activis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9(1), 55-72.
- Tomlinson, J. (2000).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U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Vertovec, S. (1999).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447-462.
- Vertovec, S. (2001).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7(4), 573-582.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Media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Program of “Taiwanese Wives”

Li-jung Wang, Wei-ching Wang, & Shu-juan Zhu*

Abstra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immigr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media have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influences on immigrants' identity: on the one hand,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media provide immigrants an important cultural link with their original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a tool for assimilating newcomers into the host socie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tension and the identity relationships formed between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by researching audience studies and the TV program "Taiwanese Wives," which was made for the special immigrant group of "foreign bride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y so doing, this research may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migrant women construct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society.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media, migrant women

* Li-jung W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Wei-ching Wang, Ph.D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Radio, TV, Film,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Shu-juan Zhu is Teacher at the Tong-ming Primary School, Taoyuan, Taiwan.